

暢談東方智慧

送書啟題

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蔣忠新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池田大作

鼎談集

商務印書館

暢談東方智慧

季羨林、蔣忠新與池田大作鼎談集

商務印書館

暢談東方智慧——季羨林、蔣忠新與池田大作鼎談集

作者：季羨林、蔣忠新、池田大作

責任編輯：黎彩玉

封面設計：楊啓業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次：2004年5月第1版

ISBN 962 07 6337 8 (精)

ISBN 962 07 6334 3 (平)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Original Copyright by Ji Xian Lin, Jiang Zhong Xin
and Daisaku Ikeda, 2002.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Ji Xian Lin and
Wang Xiu Gui and Soka Gakkai.



季羨林

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為臨清市）。1934年清華大學畢業。1935年赴德國留學，1936年至1945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1941年獲得該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歸國，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現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

主要著作有《印度古代語言論文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吐火羅文研究》、《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糖史》、《大唐西域記校註》（主編）。翻譯有《羅摩衍那》和《沙恭達羅》等。散文著作有《季羨林散文集》和《留德十年》等。



蔣忠新

1942年出生於上海。1963年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1991年任該所正研究員（教授）。2002年底去世。

主要著作有《民族文化宮圖書館所藏梵文寫本之一·妙法蓮華經（照相版）》、《民族文化宮圖書館所藏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羅馬字轉寫本）》、《摩奴法典譯註》、《大唐西域記校註》（合著）、《大唐西域記現代語譯本》（合著）、《旅順博物館所藏梵文法華經斷簡（照相版及羅馬字版）》。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授與“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證書”。



池田大作

192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作為作家、詩人和

教育家，以佛法的“人道主義”為基調，曾就和平、環境、教育等問題，提出各種建議，在許多大學作過演講，並同世界各國許多領導人、文化人、學者進行過對談。另外，還創立創價幼稚園、創價小學和創價大學等教育機構，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東洋哲學研究所、波斯頓二十一世紀中心等學術、和平機構，以及東京富士美術館、民主音樂協會等文化機構。

著有小說《人間革命》(12卷)以及對談集《展望二十一世紀》(和A·湯因比)、《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和M·戈爾巴喬夫)、《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和金庸)等一百餘部。其中大部分譯成英語、漢語等各種語言出版。1983年獲“聯合國和平獎”，並獲得北京大學等世界許多大學的名譽教授和博士的稱號。

序

·張豈之·

我用了兩個晚上，拜讀《暢談東方智慧》，饒有興趣，啟發很多。

作者都是大家，而且都是世界級。季羨老，是國際知名的東方學大師；日本池田大作先生，是國際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宗教思想家和和平人士；蔣忠新先生，是國內外屈指可數的研究梵文原本《妙法蓮華經》的專家。以這樣的陣容作“鼎談”，真可謂一種機緣，其禪言雋語，隨處可見。

書的起首，引用了湯因比博士的一句話：“開闢人類的未來只有對話”，這真是至理名言。對話，在英語叫 dialogue，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著名的《對話錄》(Dialogues)，強調透過正面的陳述和反面的辯駁，抽絲剝繭般地呈現事物的本質，循此向上推出“最根本的實在”，即 Idea。由此可見，在柏拉圖看來，“對話”乃是一種哲學的方法。無獨有偶的是，中國宋代的大學者朱熹，也經常用對話的方法與人討論學問，他提出“剝”的方法，說“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盡極無可剝處。”(《朱子語類》，卷 126) 他解釋這個“剝”字說，學者作工夫，“最怕與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是，便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同上，卷 16) 我想，通過對話，特別是大師的隨興而談，一步一步地引人入勝，把道理一層一層地展現在讀者眼

前，真是一種好方法。

讀了《暢談東方智慧》，我生出這些想法，大概正是由於該書的豐富內容和邏輯力量吧。

那末，書中為讀者“剝”出了哪些真知灼見呢？我想請大家注意季羨老對東西方文化及其同異所作的概括。他說：

東方文化的中心，我認為是“天人合一”。意思就是人與自然要成為朋友，不能成為敵人。（p.40）

我主張“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類。合，就是互相理解，結成友誼，不能相視為敵人。（p.38）

我以為，東方思想的基礎或出發點是綜合的、包容的、合二為一的思維模式，而西方思想的基礎或出發點則是分析的、排他的、一分為二的思維模式。這兩個思維有根本的區別。但這是從宏觀上來看，東西方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純粹。（p.221）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老的哲學命題，不同的思想家，可以給出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天是最高主宰，有人認為天是自然，也有人認為天是最高的思想。季羨老以自身的體認，指出天就是大自然，這不僅是一種明快的解讀，而且也牢牢抓住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題：這就是“天道”與“人道”的關係問題。

透過對話，作者們主要在兩方面把這個題目深入了：其一，探討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東方其他國家，天人合一的表現。例如，季羨老指出，中國人講“天人”，印度講“梵我”，在印度古代婆羅門哲學裏，最古的經典《犁俱吠陀》中

的“原人歌”，對天人合一思想表現得極為清楚和具體。此外，在東亞的朝鮮半島，既有自己本土的哲學思想，又受到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在三國時期已經傳入，到了高麗末李朝初期，隨着程朱之學的傳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佔了上風。這時出現了李穡（1328-1396）、鄭夢周（1339-1392）等思想家，特別是作“天人心性合一之圖”的權近（1352-1409），在他們的學說中，強調“萬物各其一理，萬理同出一源”。這些看法，對思想史的研究，都是很有啟發的。

其二，作者們探討了“天人合一”的當代意義，表達了“人類只有和自然即環境融合，才能共存和獲益”的思想。

環顧今天的世界，“城市化”、“產業化”、“現代化”、“全球化”，已經是時髦術語；與此相伴隨，“自然生態平衡”、“文化生態平衡”、“能源與水資源”、“種族文化宗教矛盾與衝突”等等，也成為大眾與媒體的“關鍵詞”（keyword）。細想，這仍然是“天道”與“人道”矛盾的表現。書中池田大作先生的許多警言妙語使人難忘。

《莊子》書中有一個關於中央之帝“混沌”的故事：他的朋友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為了讓“混沌”和自己一樣，決定為他開鑿耳目七竅，結果呢，“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寓言人不應當任意改變自然。儒家從正面講道理，用“乾稱父、坤稱母”這樣的比喻，表達了視世人為兄弟姐妹、待自然一草一木如朋友，救助老弱鰥寡孤獨的“民胞物與”的思想。這些思想在當代社會，不正可以成為對整個人類有益的“東方智慧”嗎？這正如池田大作先生在本書《前言》中所說：“我作為鼎談者的一員，希求東方智慧能在

爭取萬物共生共存的‘和平與希望’的世紀顯示其雄姿，成為指導‘人類文明’的‘光明’。”這裏我想提到，蔡德麟先生的《東方智慧之光》（副題是《池田大作研究論綱》）一書（香港：天地圖書，2003），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池田大作先生的基本論點。

順便想指出，一些西方學者對上述現象也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評。例如以寫《大趨勢》成名的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他在1999年寫了《高科技高思維》（中譯本，北京：新華，2000）一書，他批判地考察了美國文化和許多美國人沉迷於科技的現象，在書中指出：“科技充斥着美國的社會，它給人們送來神奇的創新，然而也帶來了具有潛在毀滅性的後果。”又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Benjamin J. Schwartz，1916-1999），他在臨終前寫過一篇短文：“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原載美國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中譯本發表於《世界漢學》，第二期，2003年），史華慈先生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他在世紀之交，對美國社會出現的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如脫疆野馬般失控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感到極端擔憂，他用“千禧年主義”這樣帶有與“終極關懷”相關的宗教語言，向世人發問：人作為人而言，得到越多的物質享受和滿足，就越能過得更美好、更幸福嗎？抑或這只是一個幻覺而已？

上述的這些看法，值得人們思考，對我們也是有益的借鑒。我想，有時“東方智慧”與“西方智慧”可以兼容並存，這也許就是儒家所謂的“和而不同”吧。

書中也討論了有關佛學的專門問題，特別是關於《法華

經》的起源、傳播、展開與發展，都作了細緻的評述。我對佛學知之不多，但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些都是十分有價值的內容。可惜我們的研究還很不夠，像蔣忠新先生這樣甘於坐冷板凳的專門家，我們還太少。書中蔣先生有這樣一段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說：“我自身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梵語佛教文獻學。我做過的工作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我準備讓對於梵語佛教文獻學具有濃厚興趣的學生來繼承我的研究。但是至今我還沒有發現一位這樣的學生。”(p.44) 令人惋惜的是，蔣先生說過這些話不久，便因病辭世了。上面的話，就更讓人平添了特別的感慨和思考。

書中精彩和引人思考的地方還很多，讓我們安靜地坐下來，細細地品味吧。

是以為序。

2004年2月28日

於清華園

編者註：本文作者原任西北大學校長；現為清華大學、西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前言

• 池田大作 •

為了把“戰爭與暴力的世紀”改變成“和平與共生的世紀”，“東方的智慧”能夠承擔甚麼樣的使命——圍繞這個人類歷史性的課題，我和現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兩位有識之士，進行了長達七年的交談。這個時期恰好是“激烈動盪的20世紀”過去，迎來了新的“千禧年”。

現代文明是以發祥於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為動力，給人類帶來了物質的豐富和方便；隨着通訊、信息和交通工具的發達，全球正朝着一體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化的浪潮也波及到全世界的範圍。

但是，在現在正在進行的全球一體化的背後，卻隱藏着深沉的“黑暗”。

地球環境問題、核擴散、貧富差別的擴大、難民劇增，以及圍繞民族、宗教、文化的糾紛，等等，不能不令人感到人類的“黑暗”越來越深。其象徵，可以說就是21世紀第一年秋季的“9·11”恐怖事件。

在人類歷史的“黑暗”中，仇恨產生仇恨，報復引起新的報復——這種“仇恨”的連鎖關係重重糾纏在一起。“仇恨”與“破壞”是“分裂”的動力。它會撕裂人與人的心，使民族與民族分離，使宗教與宗教對立，使人類與大自然分裂。

毫不誇張地說，現代文明的危機甚至會帶來人類的滅絕，其最大的元兇就是盤踞在人心中的這種“分裂”的動力。

與此相反，“慈悲”與“創造”的精神是一種“結合”的動力。它會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聯結在一起，把人類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引導上共生的道路。用人的生命中這種內在的“結合”的動力來抑制“分裂”的動力，將是由“戰爭”轉向“和平”的主軸。

在東方文明悠久的歷史中，洞察和開發生命中這種內在的“結合的動力——善性”的智慧，一直像鑽石般在燦爛發光。碩學季羨林先生及其弟子蔣忠新先生都在開發並用現代的知性來磨煉這種“生命之寶”。我和他們終於走到一起來了。

回想起來，是20世紀代表性的碩學、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敏銳地察知現代文明的困境，並對“西歐中心史觀”提出了異議。他反對西方文明一元論，立足於包括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的人類史的視野，生動地描述了許多文明的誕生、發展與衰亡。

我作為一個東方文明、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實踐者，30年前曾與湯因比博士進行過對談。博士一向把他深刻的目光凝視東方的睿智。他注意到中國將是“統合未來世界的主軸”。

季羨林先生是中國代表性的世界有識之士，曾任北京大

學副校長，連續56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現在仍為“終身教授”。

季先生是20世紀印度學、佛教學的最高峰，國際聞名的學者。他是東方學的開拓者，完全體現了東方的智慧，是中國學術界的泰斗，承擔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許多學術領域的領導重任。

他還是中國當代第一流的作家，寫有大量格調高尚、文體流麗的散文，被譽為“國學大師”，深受廣大人們的尊敬。

他還歷任國家各種要職，為中國人民和人類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季羨林先生和我第一次見面，是1978年9月我第4次訪華期間，我訪問北京大學並向北大第二次贈送圖書的時候。當時大學方面接待我們的主要負責人就是當時任副校長的季羨林先生。先生經歷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苦難，他的面孔仍像北京的秋天那樣明朗、樂觀。

另一位鼎談者蔣忠新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研究員，是世界第一流法華經抄本的研究者。

直接給這次鼎談創造機會的是現為創價大學客座教授的卞立強先生。卞先生是季先生擔當系主任的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身，也是季先生的弟子。當時他是北大教授，曾任東語系日語專業主任、亞非研究所副所長。他把我的十幾部著作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並向季先生作了推薦介紹。據說季先生是通過和卞先生的交談而產生了要和我對談

的念頭。在這裏向為我推薦介紹的卞立強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謝。

最初是按和季先生對談的形式進行準備的。後來考慮到在談及作為“東方智慧”的佛教，特別是《法華經》時，希望也能請季先生的高足，特別在《法華經》研究上有淵博學識的蔣忠新先生參加，提出了由三人“鼎談”的建議。季先生完全贊同了我的想法。

我們三人在東方思想悠久的歷史中，尋求把民眾、民族、宗教、文化聯結在一起的“統合”和“共存”的智慧，進行了多次對話。

通過三人的往返書信，共同探索研究的成果，分四次連載在東洋哲學研究所的學術雜誌《東洋學術研究》（第145-148號，2000年11月—2002年6月）上。在作為日文單行本出版時增加了“序章”，並對全文作了加工潤色。

本書的開頭，主要談了年逾九旬的季先生波瀾壯闊的人生，以及貫徹師生之道的蔣先生的生活信念（序章）。

接着通過季先生在佛教學和語言學方面世界性的貢獻，闡明“釋尊使用的語言”和佛教的“平等精神”（第一章）。

下面通過對大乘佛教經典編纂以來的“大乘非佛所說”論的批判，重點談了《法華經》的起源（第二章）。另外，沿着《法華經》從印度傳到中國、日本的足跡，談到日蓮大聖人的佛法（第三章），以及在現代的情況下，“法華思想”在創價學會的歷史中的發展（第四章）。

到此轉向中國哲學史，為開發人的善性，提出“性善論”

和“性惡論”，考察了“人性”（第五章）。

接着比較了東西方文化的特徵（第六章），共同討論了東方文化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依正不二”論（第七章）。

最後，在開闢21世紀人類的未來之際，互相就中國所起的作用及東方智慧的貢獻等問題，具體地交換了意見（第八章）。

通過這些談論，逐個地考察了開發包涵在東方思想中的“結合的動力”的智慧，並給它們照射進現代知性的光芒。

《法華經》的統合精神“一念三千”論、中國思想的精髓“天人合一”思想、印度哲學的極致“梵我一如”思想……這一切都會照亮不斷帶來斷裂和分裂的現代文明的“黑暗”，是珠玉般的“東方智慧”的結晶。

我作為鼎談者的一員，希求東方智慧能在爭取萬物共生共存的“和平與希望”的世紀顯示其雄姿，成為指導“人類文明”的“光明”。

季先生也曾說過，人類期待的未來是佛教稱之為“佛國土”，或者儒家描繪為“大同世界”的世界。

今年適逢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佳期。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比任何人都強烈地深深希望日中友好。本書作為日中學術文化交流的一項成果，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出版，我深信周總理也一定會為之高興。

我祈願兩位先生為人類的和平與繁榮，為增進日中友好，更加健康和活躍。

2002年8月24日

序言

• 季羨林 •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國際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宗教活動家、國際活動家。他曾同一些國際上知名的學者和政治家進行過對話活動，比如英國大歷史學家湯因比、美國的基辛格等等都包括在內。對話內容用中、日、英三國語言出版，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它促進了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理解與友誼，對當今國際上的基調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池田大作先生，同中國更可以說是特殊的關係。他曾多次訪華，同中國學者和宗教界人士廣有接觸。他是北京大學的名譽教授，又在其他大學中獲有名譽教授的稱號。他也盡上力量，向中國一些大學捐贈圖書和儀器。他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是受歡迎的人。

這一次，池田大作先生要同中國學者對話了。我濫竽充數，敬陪末座。他同蔣忠新先生的對話的內容，主要是有關《妙法蓮華經》的。蔣先生窮幾十年之力治梵文原本《妙法蓮華經》。對中國旅順博物館所藏來自新疆的《法華經》梵文原本殘卷之研究，致力尤勤，創獲至多。《法華經》是創價學會的聖經寶典，池田大作先生對此經也有湛深的造詣。因此，兩位專家有關《法華經》的對話，就十分精彩，不同凡響，精言妙語，如萬斛泉湧，不擇地而出，能開闊人的眼

界，啟發人的悟性。讀這樣的對話，簡直是一種最高的享受。

至於我自己同池田大作先生的對話，重點則在東方文化與東西方文化的同和異上。我不是哲學家，更不是甚麼思想家。我不擅長哲學分析，也不喜歡哲學分析。對於西方一些哲學家那種細入毫末的分析，我敬佩到驚詫的程度。但是，我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伊於胡底。我稟性木訥，喜歡摸着看得見的東西，對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是，我也有一點優（？）點，就是，不讓腦筋閒着，我對禪學只了解一點皮毛，可是我的思維方式卻有點接近禪宗。我在最廣的宏觀觀照下，仔細思考了東西方文化發展演變的軌跡，幾乎是頓悟般地悟到了東方文化的復興。在十幾年前，我就提出了東西文化是有根本差異的，東方綜合，而西方分析，天人合一為東方文化的特點。我對中國哲學史上這一個著名的命題給予了一個新解，就是，天人合一是指大自然與人的合一。我還提出了，在歷史上，東西文化遞相興衰的看法。我用了一句中國常用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表達我這個看法。

我這些看法，一經提出，在談者中就形成了兩派：一派贊成，一派反對。這是極其正常的現象。古今中外，就沒有哪一個看法，只有贊成者，而沒有反對者。對於贊成者，我當然高興。對於反對者，我也並不不高興。我一不商榷，二不反駁。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辯論激烈；但是沒有哪一家由於辯或